

# 关于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诗的一些史实

丁景唐

鲁迅先生同郁达夫的交往甚早。据《鲁迅日记》，一九二三年二月，郁达夫就在北京认识了鲁迅。同年秋，郁达夫到北京大学教书，又去砖塔胡同会见鲁迅先生。郁达夫在一九三八年作的《回忆鲁迅》<sup>①</sup>中，记述了他第一次会见鲁迅以及尔后与鲁迅交友的种种情景。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里也约略提到他与郁达夫的友好往来。一九二七年十月初，鲁迅来到上海，郁达夫在鲁迅的帮助和影响下，日益倾向进步。《鲁迅日记》中多次记载着他们往来的事实。一九二八年六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郁达夫协助鲁迅编《奔流》月刊。当鲁迅与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梁实秋论战时，郁达夫也接连在《北新》半月刊等刊物上写了有关卢梭思想的文章，驳斥梁实秋的谬论，站在鲁迅一边，配合鲁迅作战。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五日，在党领导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秘密召开成立大会，鲁迅和郁达夫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和沈端先（夏衍）等五十一人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坚决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等自由而斗争。鲁迅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在致章廷谦的信中曾说起他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事：“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郁达夫）”。<sup>②</sup>国民党反动派对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十分惧怕和仇恨，声言要逮捕发起人，严加惩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率先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鲁迅。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前，鲁迅亲自提名郁达夫为“左联”的发起人。

但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文化“围剿”下，面对空前激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郁达夫动摇、彷徨了。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深夜，“左联”的柔石、殷夫等五位青年作家和其他十八位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鲁迅被迫避居花园庄，郁达夫也受到警告，远走富阳家乡。郁达夫在《钓台的春昼》中曾记其事，说：“一九三一年，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眠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先在浙江附近的穷乡里，游不了几天……赶到故乡”。<sup>③</sup>第二年（壬申，即一九三二年）春日，郁达夫书录了一首龚定庵的诗以表白自己的自由主义的身份：“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sup>④</sup>他的消极动摇、逃避斗争的思想日益发展。一九三三年春，郁达夫携眷离开激烈的阶级斗争漩涡——上海，也离开了左翼文坛旗手的鲁迅，而移家杭州，妄想逃避激烈的阶级斗争，过他想象中的逍遥自在的文人生涯。

在过去出版的几本鲁迅诗歌的注释本，以及几乎所有论述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诗的文章中，普遍地流行着一种说法，以为鲁迅是在知道郁达夫、王映霞打算离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漩涡——上海而移家杭州时，才写了这首诗，加以忠告、劝阻的。事实并非如此。新近出版的倪墨炎同志《鲁迅旧诗浅说》中已列举一些事实，说明这首诗写在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是有助于理解诗的实际内容的。但他以为是在这年六月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之后，却比实际日期推后了近两个月。

郁达夫、王映霞是在一九三三年清明（四月五日）后从上海移家杭州，而鲁迅的诗则写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相隔已八月有余。

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映霞及达夫来”，翌日（三十日）“午后为映霞书四幅一律云：‘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原诗无题，现在的诗题是一九三四年十月杨霁云编《集外集》时，由鲁迅先生添上的。那年十月十三日，鲁迅给杨霁云的信中说：“我平常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找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自己记得的也不过那一点，再没有什么了。”<sup>⑤</sup>这首诗的拟题，当在写此信之前不久，但离开为王映霞写这首“四幅一律”的诗时已有十个月了。根据王映霞的回忆，她同郁达夫一家是在一九三三年清明（即四月五日）后就离开上海移家杭州，先在原杭州大学路浙江省图书馆附近的长官弄（或叫官场弄），租屋而居。后来才在比邻购地筑屋，就是所谓“风雨茅庐”。郁达夫在《记曾孟朴先生》（见《达夫散文集》）中也曾说过：“当我迁上杭州来住之先，因为时势与环境关系，不得不在洋场的上海寄寓，前年计算起来，自民国十五年年底起，一直到二十一年春天止，一共也整整住了七八年的光景。”上文中，郁达夫有一个笔误，把一九三三年春天写错，提早了一年（民国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后来，约在一九三六年初，郁达夫在一篇《住所的话》中<sup>⑥</sup>说：“三年之前，也是在一个春雨霏微的节季，……搬上杭州来住下了”。这篇文章虽无写作年月，但因与写于一九三六年初的《记风雨茅庐》一文排列一起，同收入《闲书》（一九三六年五月良友版）中，这些记载和王映霞的回忆都是相符的。郁达夫自移家杭州之后，每月仍往来沪杭之间，到上海访问友好，结算稿费，所以在鲁迅日记中常有郁达夫来访的记载。我们了解到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对我们理解诗的深刻意义是有帮助的。鲁迅是在看到了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的种种不良趋向，有可能滑向危险的道路，才借王映霞请他写字之际，写了“四幅一律”的诗章，给郁达夫以恳切的劝告，而不是在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前，先写诗阻止他的。一九三三年春，郁达夫携眷移家杭州后，就有国民党省党部办的御用报纸记者黄萍荪<sup>⑦</sup>前来采访、捧场。郁达夫在风和日丽、小山香满的西子湖边，沉溺于温馨、安逸的小家庭生活，与国民党一些官员应酬往来。他接受杭江铁路局的邀请，去浙东旅行，游山玩水，一路受到国民党官场的款待，写了一些点缀“太平”的游记之类的文章。正是在郁达夫从进步的文化前线退避到国民党反动势力根深蒂固的老窠中去营筑“安乐窝”，有了种种不良的行动和倒退的迹象，向国民党反动官僚党棍靠拢的时候，鲁迅才借诗提出劝阻和忠告的。诗中借古喻今，用五代钱肃王的暴君统治来明喻“仍如在”，又例举伍子胥、岳飞等历史人物的遭遇劝告他不要再留恋反动统治下的杭州。“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鼓励他离开杭州，换一个新的环境，到时代的风波中去，为人民“行吟”。

可是，郁达夫没有接受鲁迅对他的热情关怀和恳切忠告。一九三八年，他在写《回忆鲁迅》时，就后悔不及地回顾了这件事。他说：鲁迅“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都没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那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指此而言”。郁达夫所说鲁迅同他曾经谈起过五代钱肃王的故事，在鲁迅写的《谣言世家》<sup>[9]</sup>里就提到过：“中国人里，杭州人是比较的文弱的人。当钱大王治世的时候，人民被刮得衣裤全无，只用一片瓦掩着下部，然而还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无贰话”。据一九五八年版《鲁迅全集》十卷本的注释，这段笔记出在宋郑文宝的《江表志》里，翻检方便，这里就毋庸转录了。

近来，不少同志对这首诗的一些诗句，正在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展开着讨论。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说，郁达夫移家杭州自建房屋后，亲自写了“风雨茅庐”的匾额。郁达夫在一九三六年初写的《记风雨茅庐》<sup>[10]</sup>一文中，曾说明为这所新居起了一个“风雨茅庐”的风雅名字，无非是“避风雨的茅庐”，实际上这正是郁达夫幻想逃避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风雨的写照。横额一块，却是郁达夫请以翻译拜伦《哀希腊》和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译》<sup>[11]</sup>闻名的马君武（1882—1939年）所写。郁达夫一家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搬入新居的。事先郁达夫为《论语》第八十八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出版）写的《移家别记》，文末自署新居又写作“风雨茅处”，可见郁达夫先后随意用过“风雨茅庐”和“风雨茅处”两种室名，而“风雨茅庐”是请马君武写了横额之后才传播开的，并不是象有些同志传说那样是郁达夫本人亲笔题写匾额。

鲁迅为王映霞所书“四幅一律”，是把这首七律八句诗，用虎皮笺写成四幅（每幅两行），由受赠人裱成四屏条，起初挂在租屋里，后来就挂在“风雨茅庐”的客厅里。

在“风雨茅庐”的“安乐窝”建成后一年二个月的光景，抗日战争爆发，杭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之下，这所所谓“风雨茅庐”在民族被浩劫的暴风雨中，也沦为日本侵略军的马厩。郁达夫苦心经营的二万余册藏书，其中大部分是德、英、日文的珍本，有一部分有郁的签名，或盖印，被日本侵略军掳掠毁弃（据说有一部分被掠去日本），门窗地板全部拆除或当柴烧。鲁迅先生手书的四屏条这一宝贵文物也遭毁灭，这是革命文化事业的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

有的同志还以为杭州是郁达夫的家乡，如说郁“打算携眷回杭州家乡去住”，也是错的。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杭州是王映霞的家乡。映霞本姓金，名旭，因外祖父王二南的宠爱，过继给外祖父，随改姓王。郁达夫曾写《王二南先生传》记其人；又写《婿乡年节》记在杭州过旧历年的情况。前者收入北新版的《达夫散文集》，后者见之于《良友文学丛书》之《闲书》。《婿乡年节》也确是一篇无聊的“闲书”。郁达夫写过不少有关“婿乡”杭州和他自己的家乡富阳的文章。这里所举的两篇文章，则可作为了解郁达夫眷恋杭州的背景资料来看。

最后，还想谈一下鲁迅对这首诗的某些文字上的改动。有的同志根据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鲁迅诗稿》，以为鲁迅原写这首诗末句作“风沙”，不作“风波”，

因为第二句里已有“随波”，鲁迅可能是为避免重复而改“风波”为“风沙”的。此说其实不妥。查《鲁迅日记》，这首诗当初书赠王映霞时，末句确作“风沙”。《鲁迅诗稿》上的字幅就是根据《鲁迅日记》上这首诗的原文放大印刷的。后来一九三四年杨霁云编《集外集》时，鲁迅才把“风沙”改作“风波”。在旧诗中，同一个字在一首诗中出现两次，甚至两次以上，而又用得十分妥贴，是不乏佳作的。问题在于能否更好地表达诗的艺术形象和思想内容，鲁迅把“风沙”改为“风波”，更切合下面“浩荡”这个形容词，从而展现了阶级斗争波澜壮阔的图景。

今天，重读此诗，受益甚多。“风波浩荡足行吟”。鲁迅的诗句，激励我们的作家投身到风波浩荡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去战斗，去改造世界观，去吸取新鲜题材，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 一九七八年初春时节

附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初，我有机会从北京友人那里看到郁达夫的女儿郁正民同志《读鲁迅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有感》。觉得她写得感情真挚，阐明了鲁迅诗的主题，不仅是对当时同一营垒中的战友郁达夫移家杭州、逃避斗争的行为发出了由衷的劝告，期望他回到风波浩荡的革命激流中行吟放歌，而且对所有革命战士都有深刻的启示和效益。但文中也有一些史实需要订正。于是，引起了我看一些资料，并根据王映霞同志的回忆，写成此文。郁正民同志的文章经我添加了几个注释，订正了几处史实错误，介绍给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文教资料简报》总第75期上发表。本文完稿于一九七八年初春时节，一搁半年多，现应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之约，即以付梓。这里需要补充四点：

（一）关于郁达夫携眷移家杭州的确切日期。我们得到上海书店陈巧孙、余妙英二同志协助，已找到出处，即《达夫全集》第七卷《断残集》中的《移家琐记》，文中郁达夫引自己的日记，移家杭州的日期为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不久之前，见到姜德明同志《从郁达夫移家杭州的时候谈起》（《天津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谈到郁达夫移家杭州的确切日期，但未具体注明引自何书，现特补充出处如上。

（二）最近见到有位同志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另一位同志的话，说郁达夫移家杭州、筑起“风雨茅庐”后，在“风雨茅庐”里挂着一副郁达夫自己写的对联，录龚定庵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引录者把“都”误抄为“全”）。实则，郁达夫于一九三二年春写好后，挂在上海嘉禾里住房的客厅中，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的《现代》第二卷第一期上曾刊登了这副对联。一九三六年五月，郁达夫一家搬入新居“风雨茅庐”，客厅里挂的却是鲁迅赠送王映霞的分写在四张虎皮笺上的“四幅一律”，而并非是郁达夫自书的龚定庵诗句的对联。

（三）郁正民同志文中说，郁达夫“还主编过左联的文艺刊物”，别的同志也说他“主编过左联进步杂志《大众文艺》”。这也有误。一九三〇年三月左联成立时，郁达夫经鲁迅提名，列名左联，但他并未主编过“左联”刊物。郁主编过《大众文艺》，是在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之间，其时左联尚未成立。一九三〇年《大众文艺》是在

别人接编后，才成为“左联”刊物的。溯源这个误记，可能还在六十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大众文艺》以及《前哨·文学导报》时，对《大众文艺》说明不够详尽；《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二十九页上把《大众文艺》列入“左联机关刊物和左联成员所办的刊物”时，亦未具体说明郁达夫主编时和以后别人接编时的不同情况。现借此说明，并代更正。

（四）近见有位作者先后在一份《语文函授》和某学报上发表内容基本雷同的两篇文章。他初则把鲁迅诗中的“风波浩荡”解释为“指大革命风暴所扫荡的地区，大革命根据地延安”，续又改掉“延安”，但仍把诗中“旷远”解释为“遥远的解放区”，把“风波浩荡”解释为“大革命风暴策源地”。我们认为对鲁迅诗意的解释展开争鸣，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历史的事实却应当尊重，不宜违悖。鲁迅的诗作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当时尚未举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党中央进驻延安更是一九三六年“双十二”西安事变以后的事。查解放区的称呼，则还要晚一些，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般与国统区相对称。如说鲁迅在三十年代初期写诗，就规劝郁达夫“举家”到“延安”去，到“解放区”去，到“大革命风暴策源地”去，既违反历史事实，抑且不符鲁迅的本意。

一九七八年八月又记

注：

- ①郁达夫《回忆鲁迅》，收入《回忆鲁迅及其他》一书中，一九四〇年一月宇宙风社初版。
- ②《鲁迅书信集》上卷，第248页。
- ③见《履痕处处》，一九三四年六月现代书局出版。
- ④郁达夫手书的这首诗，后来刊登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 ⑤《鲁迅书信集》上卷，第六三八页。
- ⑥见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闲书》第五十五页。
- ⑦这个黄萍荪就是借郁达夫的介绍，向鲁迅骗取诗稿，招摇撞骗，在浙江省党部党棍们指使下，谩骂鲁迅的叭儿。现在保存下来的一篇鲁迅未发表的无题短文，对这个叭儿噓了一下。
- ⑧见《南腔北调集》。
- ⑨郁达夫《记风雨茅庐》，见一九三六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闲书》，第六十三页。
- ⑩马君武译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